

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

主编 王振民

晏子研究文集

齐鲁书社

晏子研究文集

主编 王振民

齐鲁书社

1998年

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

晏子研究文集

主编 王振民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360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

ISBN 7—5333—0687—2

Z · 78 定价：26.00 元

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

编纂委员会

顾问 郑金兰 鞠法昌 姜绍华 王承典
高玉清 李学勤 孟世凯 蔡凤书

主任 王振民

副主任 韩明光 张洪全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志强	王华庆	王纪刚	王坤宗
冯延生	孙敬明	张金良	杨金礼
单继瑜	范成仁	南学双	秦志功
徐衍进	徐保福	曹元启	曹旭辉
樊光辉	穆世生	戴维政	

主编 王振民

副主编 张洪全 孙敬明 杨金礼

编辑 朱英 田永德 盛治刚 张继

序

我的家乡高密双羊镇郑公村一带自古山水灵秀，向多人文古迹。从孩提时代就听乡人们说晏子、郑玄等这些圣贤先哲的民间故事。清明时节，也时常随大人们去郑玄祠、袁绍墓、倾王冢、张良沟、韩信坝，乃至高密国遗址等处凭吊游览。高密国遗址就在郑公乡东南不远处，至今还残存着汉城墙、护城河，人们也不时地发现祖先们用过的劳动工具及生活用品。上学读书，每当读到对家乡名人的记载和描述时，就会从心底里涌动着一种无限的自豪情感。也许受其影响，在我上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学，于是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几年来，曾涉足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从中窥见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奠基者，应当首推孔子与晏子，多少年来，这两位文化巨人，被人们传颂着，并对东方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早就想对潍坊的名人进行系列研究，但时机一直没有成熟。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几个学者教授谈起此事，他们很以为然，积极支持这一课题的研究。潍坊乃齐国故地，历史悠久，文化渊源积淀丰厚，历代人才层出不穷，他们都曾为潍坊创造过许多业绩，留下了很多风流佳话。

古人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

失。研究古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繁荣发展今天的潍坊。过去十多年里，我们着重对潍坊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挖掘和利用。风筝，仅仅供儿童们玩耍的一件小玩意儿，却给潍坊经济带来了莫大的效益，银线连四海，风筝传友谊，现在世界无处不知潍坊是世界风筝都了。潍坊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也为之而腾飞。如果说风筝的研究和利用是开端的话，那么对地方名人研究和利用，将是一个飞跃和发展。学者们在谈及这一课题的时候，不无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壮举。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地方名人是晏子。晏婴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法先王、行仁政、薄徭役的仕君治国方略，兼相利、交相爱，出使不辱使命的外交政策和节俭节用的廉政思想，直至在两千后的今天，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历时一年，《晏子研究文集》即将出版，此集为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之首，作为晏子同乡晚辈的我，倡导和主编了这个集子，并得到了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赞扬支持，纷纷写出了卓有成见的锦绣文章，为历史的研究、为潍坊的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向大家推荐这本好书。

王振民

1997年6月9日

目 录

序.....	王振民(1)
《晏子》研究二题.....	李学勤 (1)
晏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姜国柱 (11)
晏子·《晏子春秋》·超越儒墨	刘宝才 李仙娥 (30)
《晏子春秋》与晏子思想.....	刘式今 (41)
晏孔异同论.....	吕文郁 (55)
晏子与孔子天命鬼神观之比较研究.....	冯 潇 (78)
晏子的经济思想	叶世昌 童 丽 (156)
晏子理财思想研究	陈光焱 熊良春 (164)
论晏婴的廉政思想和事迹	李永先 (175)
晏子节俭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史延庭 (196)
晏子的廉政思想与崇高品格	刘安泰 (202)
论晏婴的政治实践	宣兆琦 尹宗基 (217)
晏婴治国方略刍议	林永光 (230)
晏子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	宋玉顺 康仲彩 (244)
浅谈《晏子春秋》中的孔子论 晏子	方子玉 曹俊霞 张 亮 (252)
晏子思想渊源探略	王 超 张 继 (257)

从当今我国的成功外交看晏子的 外交政策策略和风格	张锦良	(272)
晏婴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简析	李宏生	李伟 (284)
晏子与燕、齐邦交	陈平	(294)
晏子的外交思想	陈东霞	(303)
论晏子以民为本的“治国方案”	冯潇	(310)
晏子所处时代背景及事君恤民 思想试析	郑洪春	(381)
谈晏子的爱民主张与墨子的民本 思想	沈长云	白国红 (388)
孔、晏民本思想的深层思考	刘玉明	黄娜 马洪喜 (401)
晏子爱民思想简论	齐姜红	(423)
简论《晏子春秋》中的爱民思想及其 事迹	盛治刚	(431)
论晏子和齐文化	安作璋	高广政 (448)
东周齐国彩绘陶初探	靳桂云	(460)
从汉画像中说晏子	蒋英炬	蒋群 (474)
读两周金文札记——晏子世家小考	孙敬明	(487)
晏子简评	李恩昌	(496)
晏子年谱	赵金炎	(516)
后记		(560)

《晏子》研究二题

李学勤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属于汉武帝早年的墓葬里出土大量竹简，其中有《晏子》，材料公布以后，激起学者们对《晏子》一书的关切和讨论。此次《晏子研究文集》的辑集，必多鸿文，推进《晏子》各方面的研究。我这篇小作，只想对两个有关问题陈述陋见，敬希方家赐予指教。

一、《晏子》与墨家

《晏子》自刘歆《七略》列为儒家，见于《史记·管晏列传》正义所引，《汉书·艺文志》因之，且为《诸子略》儒家之首。至唐代，柳宗元撰《辩晏子春秋》，提出应改列于墨家，他说：

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

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①

随后学者从其说者甚多。直到三十年代辑印的《诸子集成》，竟把《晏子》干脆列在墨家。

反对柳说的人当然也有，影响最大的是清代孙星衍《问字堂集》所收《晏子春秋序》：

善乎刘向之言：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无学，谓墨氏之徒为之，《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承其误，可谓无识。晏子尚俭，《礼》所谓“国奢则示之以俭”，其居晏桓子之丧尽礼，亦与墨子短丧之法异。《孔丛》云：“察传记，晏子之所行未有异于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圣门，晏子尼谿之阻何害为儒？且古人书，外篇半由依托，又刘向所谓“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恶得以此病晏子？王鸣盛《蛾术编》等所论大抵相同，详见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附录四《有关晏子学说学派讨论》^②。

柳宗元之说可能是受《孔丛子》的影响。《孔丛子》中传为孔鲋所作的《诘墨》篇，所评都见于《晏子》，因而宋代薛季宣作《晏子春秋辨》，指责柳宗元为“掠美瞽世”^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得在这里作一考察。

《诘墨》系《孔丛子》第十八篇，宋咸注云：“墨翟著书，诬称孔、晏之事，故孔鲋诘辨之。”篇中引文九条，

均冠以“墨子称”或“墨子曰”，“墨子”当是书名。其前五条都是撮引《墨子·非儒下》，各条的顺序也和《非儒下》一致。

应该注意的是，《诘墨》批评《墨子》，仅由孔子与晏子关系这一点着眼，对《非儒下》前半与晏子事迹无涉的部分并未置评，也不提及现已佚失的《非儒上》或《墨子》其他篇章。

《非儒下》记述孔、晏之事各条，有一条见于今传本《晏子》，即第二条“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谿”，这段文字大体同于《晏子》外篇第八即“不合经术者”的第一章《仲尼见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为不可》。但景公欲封孔子的地名，《非儒下》作“尼谿”，《晏子》则作“尔稽”，银雀山简有此章，也作“塗稽”。《孔丛》亦作“尼谿”，显然来自《墨子》而不是根据《晏子》。

《晏子》这一章以“仲尼乃行”作结，《墨子·非儒下》则有“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鶡夷子皮于田常之门”云云许多文字。银雀山简《晏子》仍作“中（仲）泥（尼）口去”，虽与今传本有异，意思是一样的。按前人已指出，吴国之亡在孔子卒后六年，其后范蠡适齐，更名为鶡夷子皮，孔子树他于田氏之门是不可能的。《非儒下》所说，大概是墨者之徒所增益。孙星衍说这些话“疑本《晏子春秋》，后人以其诋讥孔子，乃删去其文，改为‘仲尼乃行’四字”^④，是不对的。

《孔丛子·诘墨》所撮引还有三条，不见于今传本《墨子·非儒下》，而见于《晏子》外篇第八，即其第六章《仲

民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第三章《仲尼见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见寡人宰乎》和第四章《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致问》、第二章《景公上路寝，闻哭声，问梁丘据，晏子对》。《诘墨》有一些异文，同时把《晏子》外篇第八的三、四章视为一章。《诘墨》这三条上均有“墨子曰”，可知当时《墨子》有这三段文字，可能是后来脱失了。

《墨子·非儒下》为什么收入这些孔、晏事迹的记载？毕沅曾提到，《非儒下》没有“子墨子言曰”字样，是“门人小子臆说之词”吴毓江云：“此篇所举或琐细，又无‘子墨子言曰’，与《尚贤》等有上中下三篇者亦不同，明非尽本墨子。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与上文就事立论者显然有别，不类一篇文字，疑经后人补缀窜乱，非墨书之旧也。”^⑤按篇文“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就是孔、晏事迹，足见这些事迹是援引来作为孔子之行的例证的。“以所闻孔丘之行”等句，既以结上，又以启下。

《非儒下》确实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至少不全是他的手笔，而是其徒裔编录而成。墨者采集《晏子》中与他们的观点符合的内容，附于篇后。他们所见的《晏子》，有些是刘向、歆父子不及见的，从而未能收入传世本《晏子》。

墨家推崇晏子，在《晏子》书中有明确证据，这便是柳宗元讲到的“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按《晏子》有的章末附有议论，例如：

君子曰 见内篇《问上》第一章，《杂上》第十二、第二十四章，《杂下》第二十一章及外篇“不合

经术者”的第十五章；

仲尼闻之曰 见内篇《杂上》第十六章；

墨子闻之曰 见内篇《杂上》第五章。

大家知道，类似的议论在先秦书籍中屡见，如《左传》、《国语》、《谷梁传》、《礼记》。《左传》中的“君子曰”，宋人林黄中、清人刘逢禄、皮锡瑞等以为刘歆所附益，杨向奎、郑良树两先生已有专文驳正。他们还证明了所谓“君子”有的是与史事同时的人，有的是后世之人，后者包括孔子以及《左传》的作者，证据坚强，殆无疑义。^⑥长沙马王堆帛书中一种被整理者称作《春秋事语》的书，也有类同的体例。

《左传》等书都出于儒者之手，所记议论多属孔子及其徒裔，《晏子》则有一条议论属于墨子：

景公与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称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归，负载使人辞于公，曰：“婴故老耄无能也，请毋服壮者之事。”公自治国，身弱于高、国，百姓大乱。公恐，复召晏子，诸侯忌其威而高、国服其政。田畴垦辟，蚕桑黍收（牧）之处不足，丝蚕于燕，牧马于鲁，共贡入朝。墨子闻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穷矣。”^⑦

查齐景公之卒在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即公元前490年，其时墨子未生，所以墨子的议论显然发于事后。这项议论，一方面说明墨子思想有与晏子共通处，故许晏子为知道，另一方面也暗示《晏子》的传流者同墨子有某种联系。

把上面所述合起来看，墨子曾称颂晏子，墨子之徒又采取《晏子》文字，附入《非儒下》篇，《晏子》和墨家关系可谓密切。但晏子其人及《晏子》其书究竟不属墨家，《孔丛子·诘墨》以及反驳柳宗元的一些学者都已经解说清楚。先秦诸子的家派本来也不是那样界限分明，当另文详论。

二、论外篇不合经术者

银雀山简《晏子》，和好多简帛书籍一样，是一种节抄本，故仅存十六章，但这个发现为研究《晏子》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很重要的新论据。

今传本《晏子》书首保存有刘向叙录，详述他当时编定此书的情形：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考讎，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天’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略略（简），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同刘向一道整理《晏子》的是杜参，其著作有《博士弟子杜参赋》二篇，见《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言：“刘向《别录》云：‘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刘歆又云：‘参，杜陵人，以阳朔元年病死，死时年二十馀。’”^⑧他曾

随刘向校过若干书籍，见《北史·樊逊传》。阳朔元年系成帝年号，即公元前24年，可知《晏子》的编定在成帝早年。

刘向、杜参的工作是很仔细的。他们整理的《晏子》，将中书、外书四种本子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内，共编成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今传本正是这么多篇章^⑨。

叙录又说：

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

刘向等所定《晏子》为八篇。《史记·管晏列传》正义引刘歆《七略》云七篇，当如清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所论，是把刘向编定的后两篇合而为一。《汉书·艺文志》仍列八篇，乃据刘向原本。

今传本《晏子》一般分为内篇、外篇。内篇《谏》、《问》、《杂》各有上下，合共六篇；外篇则为“重而异者第七”和“不合经术者第八”。这种划分，虽未必是刘向时原有，但显然系本于叙录，而且是现在可知的最早本所已有的。外篇在叙录中受到贬抑，特别是第八篇被指为不合经术，疑是后世辩士所为，历代学者多加否定。该篇一共有十八章，不少传本或有脱缺，例如明黄之案本无第七至第十三章，杨慎评本无第七、十一、十三、十四章，清吴鼒本无第十、十一、十三、十八章^⑩。这一篇是否可信，能不能同其他篇相提并论，很值得讨论。

让我们先看一看，这十八章为什么被剔出，怎样是“不合经术”。

这个问题，叙录并没有详细解说，而所谓元刻本则在章末作了说明，可以认为是对刘向本意的一种推断。其所列举的理由，大体不妨分为四类：

首先是对孔子不敬。该篇已将这类五章排在一道，即篇内的前五章。元刻本在第一章末注称：“此并下五章皆毁诋孔子，殊不合经术，故著于此篇。”汉人所云经术是指儒经，自然要尊孔。讥评孔子，即不合经术，容易理解，用不着深论。

第六章《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晏子赞许孔子，同时设计“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在孔子失意于鲁的时候，反拒而不纳，以致孔子困于陈蔡。元刻本注云：“此上五章皆毁诋孔子，而此章复称为圣相，设相齐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于此篇。”章文认为孔子落入晏子设计的陷阱，实际也是对孔子的毁谤。

其次叫做“无以垂训”，包括第七、八、十、十二等章。从传世《说苑》、《新序》、《列女传》，不难知道刘向强调著作的道德意义。如果不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没有教训世人的作用，便是“无以垂训”了。第七章晏子答有臣而强，以汤为例，云弑其君；答有兄弟而强，举桀为例，云亡其兄^⑩，至少汤的例子有问题。第八章景公请晏子发愿，到第三愿竟说出“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也有问题。第十章田无宇讥笑晏子：“位为中卿，田七十万，何以老为妻？”虽受到晏子反驳，元刻本注仍认为“陈（田）无宇虽至凡品，亦未应以是诮晏子”。这些都有

违道德准则。至于第十二章，晏子主张“拒欲不道，恶爱不祥”，以及景公后来的表示，更为当时道德规范所不容。

第十五章《庄公图莒，国人扰，给以晏子在，迺止》，元刻本注云“特以晏子而给国人”，这也可以说是失道德标准。

第三类名为“义无所取”。第十三章《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详（佯）对》，元刻本未注云：“此并下一章语类俳〔优〕而义无所取”。景公提出虚假的问题，晏子给以虚假的解答，这和第十四章《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晏子对》一样，都没有什么值得吸取的教训。“无以垂训”指在道德上有所违反，“义无所取”则指缺少积极的意义，二者近似而略有不同。

最后，第十六至十八章，元刻本注云：“皆晏子歿后景公追怀之言，故著于此篇。”

在这四类理由中，前两类是主要的。由此可知，所谓“不合经术”，实际就是违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儒学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元刻本注所说，应该是近于刘向本意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银雀山简《晏子》虽仅有十六章，却含有今传本“不合经术者”中的两章，即第一章和第十八章。看来《晏子》原书并不那么合于汉人推崇的道德标准，这可以作为《晏子》形成较早的一项证明。这些章文的剔出，甚至在后世的传本中脱失，乃是从儒学道德标准衡量的结果，不能据以判定其来源有什么疑问。

注释：